

书房



《镜子:照出你看不见的世界史》
[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著,张伟勘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乌拉圭著名作家、记者,1940年生于蒙得维的亚,早年从事新闻工作,1973年乌拉圭军事政变后入狱,后流亡至阿根廷,之后又因受阿根廷军事独裁政权迫害远走西班牙,直至1984年才结束流亡生涯,回到故土,在蒙得维的亚的海岸边思考、写作、散步至今。

加莱亚诺和他的《镜子》

文/张伟勘

很难就这本书给出一个明确的上架建议:论主题内容,它该归入历史类,但这实在算不得是一部“严肃”的世界史,历史哪能这么天马行空地写呢?论行文风格,它该归入文学类,但据作者自己说,他讲述的这几千年以来的事情都是有据可查的史实,这算什么体裁的文学呢?在加莱亚诺的笔下,诗歌、散文乃至新闻报道之间的界限模糊了,与此同时,传统主流价值观所划定的边界被他冲击得七零八落,被遗忘的人们从历史之河中浮现出来,于是就有了这六百多个小故事,它们组成了一部别样的全球史。

黑人用乌黑的手臂建起了白宫,却被拒斥在美国独立的盛典之外。同样没有受到邀请的,还有印第安人、女人和穷人。在墨西哥大革命中,妇女们走出厨房,背负炊具为她们的革命者丈夫和兄弟提供后勤保障,当他们乘坐火车进军时,她们只能坐在车厢顶上,革命结束之后,没有人付给她们任何抚恤金。在历史的舞台上,他们只是群众演员,分享极低的片酬,极少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没有权力,也就没有说话的机会。我们认为他们不说话,也就当他们不曾存在过了。从原始人到二十一世纪的文明人,这些小故事试图让曾经沉默的人开口说话。即使他们说不出话来,我们也第一次知道了他们的想法,知道了他们的欲望和诉求。这部世界史也没有刻意回避正史中的主角们,只不过是用另外的方式描述他们。资本主义的伟大先驱者,是口衔匕首、单眼蒙布、肩上站着只鹦鹉的。这个人是什么做的?你猜。在加莱亚诺略带调侃的笔调中,那些堂而皇之的神话露出了它们的本来面目,可叹日光之下原来并无新事。

我们总认为历史是呈直线发展的,人类只会变得越来越好;或者,历史是呈螺旋式发展的,人类会在某些时候有所退步,但若看总体趋势,仍是朝着越来越好的未来迈进的。为了发展,我们可以在某些方面作出一些让步,可以作出一些暂时的牺牲,但总归会越来越好。经济学家这么看,人文学者也这么看,

我们在数字的欢歌里迷醉自己。在《科技革命简史》这一节里,加莱亚诺写到:“我们发明了武器用来自卫,却被武器夺了性命;我们发明了汽车用来行路,却被汽车阻挡了脚步;我们发明了城市是为了相聚,却被城市疏远了彼此。我们成了我们的机器的机器。”在《屠杀世界的战争》这一节里,“二十世纪的科技进步将抵得上人类历史前两万年的所有进步,但谁也不知道,人类到时候会在哪个星球上庆祝这些进步。”历史是在发展的吗?人类生活真的越变越好吗?在这本奇特的世界史里,我们找不到肯定的论据。“宏大叙事”的主线没有了,大历史碎成这一长串小故事,每个人可以对历史作自己的解读。这就是后现代的叙事。地理的中心也没有了,“文明”不再仅仅属于西方,世界因它的多样性而美丽。我们可曾不带偏见地去认识陌生的世界、去拥抱他者呢?加莱亚诺曾经这样定义“国际化”:“就是把自己与他人视为一体,把你身边的人、远方的人乃至还没有出生的人都当成是你的兄弟。”与国际接轨,不是与国际市场接轨,而是与所有的人分享共同的命运。这种“全球化”,与我们惯于理解的那种“全球化”不是一回事吧?我们需要听到这样的思想,哪怕是不成系统的片言断语,不是因为我们的思想里缺乏这些东西,而是因为它们本来就有,却被我们遗忘了。■

《镜子》选段:

盛会之路

亚当和夏娃是黑人吗?

人类的世界之旅,从非洲开始。我们的祖先从那里出发,开始征服地球。不同的道路开启了不同的命运,太阳负责分配肤色。

今天的男男女女,是地上

的彩虹,我们比天上的彩虹拥有更多的颜色;但我们都还是非洲移民。就连最白的白人也来自非洲。

今天我们不愿记起我们共同的起源,或许是因为种族主义制造遗忘,或许是因为我们

怎么也无法相信,在那个久远的年代,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国土,是一幅没有国界的巨大地图,而我们的一双腿,是唯一须持有的护照。

人

达尔文告诉我们,我们是猴子的表亲,而不是天使的表亲。后来我们知道,我们来自于非洲丛林,不是给什么水鸟从巴黎带来的。不久之前,我们又得知,我们的基因和老鼠的基因几乎一模一样。

现在我们不知道我们究竟是上帝的杰作还是魔鬼的恶作剧产物。我们,人:

一切的毁灭者,

偷袭近亲的狩猎者,

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的发明者,中子弹是最健康的一种,因为它能消灭人,保全物,我们是唯一一种能创造机

器的动物,

唯一一种为自己造出来的机器充当奴仆的动物,

唯一一种吞噬自己家园的动物,

唯一一种在自己饮用的水和供自己吃饱饭的土地中投毒的动物,

唯一一种能出租或出售自己也能出租或出售自己同类的动物,

唯一一种出于快感而杀戮的动物,

唯一一种会动用酷刑的动物,

唯一一种有强暴行为的动

物。

同样也是

唯一一种会笑的动物,

唯一一种能醒着做梦的动

物,

唯一一种能用蚕的唾液制丝的动物,

唯一一种会把垃圾变成好看东西的动物,

我们发现了连彩虹都未曾见识过的颜色,

我们为世界的多种声音增

添了新的音乐,

我们创造了词语,让现实和现实的记忆

不致沉默。

现代艺术的诞生

非洲的雕刻家一边劳作一边歌唱,历来如此。他们要一直唱到作品完工,让音乐栖身作品之中,并在其中继续发声。

1910年,在一个叫奴隶海岸的地方,里奥·弗罗贝纽斯面对他发现的几尊古代雕像惊叹不已。

这些雕像优美之极,令这位德国探索者认为,它们是古希腊人的作品,是从雅典流落至此的,也有可能是来自消失

了的大西国的创作。他的同行与他意见一致:非洲,只配受鄙视,只能生产奴隶,不可能是这些绝妙之作的作者。

但他们错了。这些充满音乐的雕像,是几百年前在伊菲诞生的。伊菲,世界的肚脐,是约鲁巴人的神给女人和男人赋予生命的圣地。

非洲仍源源不断地喷涌出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值得赞颂,也值得偷盗。

保罗·高更,这个放浪形骸的男人,好像就曾在一对来自刚果的雕像上签下自己的名字。错误是会传染的。自此,毕加索、莫迪利亚尼、克利、贾克梅蒂、恩斯特、摩尔等欧洲艺术家也相继犯错,而且还屡屡犯错。

饱受殖民者的掠夺,非洲都不知道,二十世纪欧洲绘画和雕塑最辉煌的征服成就,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她。

马拉多纳

在他之前,没有哪个足球明星会口无遮拦地控诉掌控足球生意的老板。他是历史上最有名也最有人气的运动员,他主动站出来为没有名气也没有人气的运动员打抱不平。

这位慷慨大方、乐于助人的偶像人物,曾经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制造了足球史上最矛盾的两个进球。这两个球令他的球迷对他顶礼膜拜:值得景仰的,不仅是第一粒球,这位艺术家简直是双腿着魔,也许

第二粒球更值得景仰,这一球充满赌气,是他一手偷来的。马拉多纳受人喜爱,不仅是因为他常耍些惊世骇俗的花招,更是因为他是一尊劣迹斑斑的神,有罪过的神,众神之中最接近人的神。每个人都可能在他身上找出或这或那的人性的弱点,或说至少是男人的弱点:好色、贪吃、酗酒、惯于使坏、爱扯谎、喜欢炫耀、不负责任。

但神是不会退休的,哪怕他再像人。

他从无名的人群中来,却再也回不去了。

名声让他摆脱了贫困,也让他成为囚徒。

马拉多纳被罚自认为马拉多纳,于是不得不成为每一场欢会的明星、每一次洗礼的宝贝、每一回守灵仪式的死者。

比可卡因杀伤力更大的,是成功因。不管是尿检还是血检,都查不出这种毒品。

直播现场

整个阿根廷都在观看。
精彩节目,实时转播。

2000年的一个上午,一头公牛,应该是黑色的,出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一条街道上。电视台全程关注,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这起事件仿佛是斗牛与战争的综合:记者们的讲述方式,用的是报道攻克柏林的史诗性悲剧式语调,其情绪渲染力之强,如同在转播塞维利亚斗牛场上的一场激战。

一上午过去了,警察还没赶到。

那头对人构成威胁的畜牲吃起草来。

惊恐万分的居民隔得老远观望。

“当心,”一个记者手拿麦克风,穿梭在人群中,提醒众人:“当心啊,这畜牲有可能突然情绪激动起来的啊。”

野兽则细细嚼着草,不理睬所有人,专注于它在灰色的楼群中发现的这块野地。

最终,数辆警车赶到,下来一大群警察,兵分数路包围了这头公牛,望着它,不知道该做什么。

此时,人群中冲出几个自告奋勇者。他们扑向猛牛,将它掀翻在地,然后一顿拳打脚踢,用锁链将它牢牢捆住,充分展

示了他们的勇气和灵巧。摄像机记录下他们中的一人得意地把一只脚踩在战利品身上的那一刻。

牛给送上一辆小车拉走了。它的头还悬在外面。只要它一抬头,拳头就如雨点般砸来。众声高呼:

“它想溜!它还想再溜一次哪!”

于是,这头刚刚长出角来、从屠宰场出逃的小牛犊就这样完蛋了。

餐盘是它的最终归宿。其实它从来不曾梦想做电视明星。

街头有危险

从大半个世纪前开始,乌拉圭就再也没有赢得过一届世界杯冠军,但它在军事独裁统治期间赢得了其他方面的世界冠军:它一度是政治犯和受酷刑者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国

家。

关押人数最多的监狱名为“自由”。被囚禁的词语从监狱中逃逸而出,仿佛是在对这个名字致敬。从铁栏间溜出了犯人们写在方寸卷烟纸上的诗

歌,比如这首:

“有时候下雨,我爱你。
有时候出太阳,我爱你。
监狱只是有时候有。
我永远爱你。”